

東亞社會研究

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



110
G7
193

东亚社会研究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号

书 名：东亚社会研究

责 任 者：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标准书号：ISBN 7-301-02268-9/C·70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100871

排 印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版本记录：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25印张 285 千字

1993 年 9 月第一版 199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册

定 价：9.50元(平)



目 录

上 篇

汉文本代序	司马义·艾买提	(3)
绪言	中根千枝	(5)
人的研究在中国——一个人的经历	费孝通	(10)
费孝通先生：一些个人的评价	乔 健	(20)
中国社区研究的生命力 ——费孝通教授社区研究实践	潘乃谷	(29)
关于东亚社会比较研究的一些思考	李万甲	(37)
研究东亚的自身社会的人类学	末成道男	(48)
试中国式社会学研究的关联概念与命题	李沛良	(65)
内发型发展论：以日本为例	鹤见和子	(77)
本土型发展论：以中国为例	宇野重昭	(85)
致中和——论传统中国乡民的基本价值取向	李亦园	(95)
离开“土”范畴：关于白族守护神总称的研究	横山广子	(109)
韩国人与日本人的历史观	伊藤亚人	(121)
当代韩国祖先崇拜热的社会政治意义	金光亿	(130)
人类学的应用	利萨·皮蒂	(150)
再谈人的研究在中国	费孝通	(161)

下 篇

中国民族的现状与前景	司马义·艾买提	(168)
关于乡镇发展的思考	费孝通	(177)
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	费孝通	(193)
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思考	费孝通	(208)

社会学重建的回顾·····	费孝通	(225)
在福冈亚洲文化奖授奖纪念讲演会上的讲话·····	费孝通	(228)
费孝通社会学思想·····	刘豪兴	(233)
社会学的重建、探索和突破 ·····	韩明谟	(271)
社会通论的建构:费孝通的方法 ·····	丁元竹	(288)
费孝通民族学术思想述略·····	徐 平	(314)
编后记·····		(324)

上 篇

汉文本代序

——在东京“东亚社会研究国际讨论会”上的致词

司马义·艾买提

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朋友们：

首先，我从心底感谢尊敬的中根千枝先生和乔健先生给我这一机会与诸位学者、教授在这里相会。能来这里祝贺我所尊敬的费孝通教授的80岁生日和他卓越的学术成就，我感到非常荣幸。同时，我也期待着与各位朋友进行学术交流并从你们的研究成果中获得教益。

在参加这个讨论会之前，费孝通教授向我提出了一个论题，“中国民族研究的现状和前景”，我欣然接受了。这是因为在中国，民族研究一直受到足够的重视，呈现出繁荣、活泼的气氛。我将在这里介绍中国民族研究的概况，相信诸位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朋友们会有一定的兴趣。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比较了解这一领域的情况。这里，我想简要介绍中国民族的基本情况和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从事民族研究的机构、人员和成果，还包括对中国民族学研究现状及发展前景的估价。报告我已印好，如果你们对此感兴趣的话欢迎你们研读，更欢迎你们批评指正。

民族问题是人类社会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需得到足够的重视，在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中应予以正确的处理，并有赖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包括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类学学者和社会学学者的

努力。这些学者正在进行着一项伟大的事业,履行着重要的义务和责任。当然他们应该为人民所尊重,其研究成果更应该得到社会的极大的重视。

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不仅需要学者个人勤奋的努力,而且也需要学者之间经常性的交流和有效的合作。因此,我希望通过这个讨论会来加强中国与世界研究者之间多种方式和多种途径的交流、合作。我将尽我的微薄之力去促进这种交流和合作。我认为合作的前景是非常美好的。

我祝愿费孝通教授健康、长寿,研究工作取得更大的进步。祝在座的诸位朋友幸福、健康。

谢谢!

1990年12月12日

绪 言

中根千枝

这本集子所收录的是 1990 年 12 月在东京举行的“东亚社会研究国际讨论会”的论文。该讨论会由费孝通教授、乔健教授和我筹备。乔教授和我提议以庆贺费教授八十寿辰的名义来召开这次讨论会，费教授欣然应允。我们决定将东亚社会即中国、韩国和日本作为会议的主题，邀请做过这类研究、熟悉费教授及其作品的学者参加。同时我们还邀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司马义·艾买提先生，他为大会致了开幕词。

中国、韩国和日本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有着共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即广义的中国文化特别是汉文化。尝试着把他们召集在一起来讨论东亚社会，这也许是第一次。尽管韩国和日本思想中的许多关键概念源于汉文古典，但却很少有人试着对这三个社会进行科学的比较研究。虽然这三种文化都在书面语言中使用汉字，而且三种社会彼此具有一般互通性，但是东亚的社会科学家却很少有人使用第二种东亚语言。事实上，这次讨论会使用的是英语，即与会者都会使用的唯一语言。

我们的动机是通过社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考察和促进东亚社会研究。这些学者所处的传统与西方截然不同，他们主要讨论了：第一，如何解释他们的发现以使它们能与西方社会科学接轨；第二，在其特定的社会中，作为社会科学家如何处理问题。在

费教授的主题演讲中,他用自己的经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费的个人经历讨论涉及了 E. 利奇(Edmund Leach)在其《社会人类学》(1982)中讨论过的问题:(1)像中国人类学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2)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

费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费强调,人类学家脱离不了他所属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他说,他之所以改学人类学是为了寻求加速中国社会进步的观点和方法。很自然,他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社会。不过,在讨论会结束时的讲话中,费又说,对人类学家来说,多经历一些和自己文化不同的文化是有益的。回首往事,费总结到,他的汉族社区研究大大得益于早年在云南时对少数民族研究的经历。在我的《社会人类学:东亚社会比较研究》(1987)中,我曾指出,在自己社会以外的社会从事田野工作是重要的。中国和印度的人类学家很幸运,他们能在本国内找到不同于本民族的社会群体。而在日本却不行,人类学家必须到国外去才能获得这种经历。

至于第二个问题,费深信可以用类型比较的方法通过一个一个社区的调查来逐步接近于认识社会的全貌。虽然中国的农村是各式各样的,费敏锐地指出,“江村是中国农村,而不是别国的农村”。我认为,尽管我们的方法不同,但乡村研究在日本也是如此。我对中国和韩国农村知之不多,但我支持费关于中国农村的观点。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对中国、韩国和日本社会进行成功的比较。

这次讨论会上,所有的与会者都同意费的观点,因此,提交给会议的所有论文都在这方面或那方面联系了费的著作和事业。乔健评价了费的成就和人类学方法,他以社会政治为背景分析了使费经受住中国几十年风雨的学术成就。乔教授细致的观察与分析表现了他对费所卷入的政治舞台的深深了解。费的同事潘乃谷评论了费在过去六十年里的活动,特别是 1982 年以后为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学所作的努力。

除了个人问题以外,东亚人类学学者和社会学学者还有许多必须解决的方法论问题。就历史传统和文化遗产而言,东亚与西方的距离比其他地区与西方的距离更远。此外,作为人类学研究的田野,东亚社会从根本上不同于人类学家通常所说的田野。事实上,东亚学生常常要与西方社会学流派作艰苦的斗争。随意地把某些概念和方法运用于本土研究常常会产生一些蹩脚的结论,反映不了所研究的社区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如果没有受过严格的社会科学学科训练,就很容易陷入传统学术术语的泥沼,所得到的结果只能是难以理解的描述或空想并由此给人们制造对传统做研究的障碍。受过西方训练的东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面临着许多两难境地,特别是当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必须逐步形成自己的方法论。

在这一点上,韩国社会学家李万甲讲述了自己的治学经历并列举了他与美国社会学家讨论过的事例。李强调,在研究东亚社会时,应该在对自己社会和相邻社会的历史有相当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调查。在进行东亚社会的比较社会学研究时,李认为,重要的是考察传统社会解体前的那一时期。他还认为有必要探讨中国、韩国和日本社会的差异,如比较三社会的家庭观念。尽管三社会都用相同的汉字(发音互不相同)来表示“家庭”,但其家庭制度的概念和结构却极不相同。正如李所说,我曾讨论过三社会中前现代精英的群体结构和社会特征(中根千枝 1987)。

就费所谈的研究自己社会一事,末成道男比较了人类学家研究自己社会的利与弊,并就中国、韩国和日本人类学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讨论。因为许多日本学者常在海外从事研究,所以他只考察了中国和韩国学者研究自己社会的大部分事实。

依据费在讨论传统中国农村时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李沛良考察了现代香港华人社会中的相似型式,并有所发展,他认为朋友和亲属关系靠经济利益关系维系着。在建立非血缘亲属关系时,香港人也使用一些传统策略并使用“缘份”概念。李指出了在

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重要性,并认为对它的研究有必要联系当地实际而不要依附于西方舶来的概念和命题,这样才能促进作为一门国际性学科的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

两位日本社会学家鹤见和子和宇野重昭讨论了与现代化有关的问题,他们都曾在费研究小组的赞助下在苏南做过小城镇研究,并发展了“内发型发展”理论。根据这一理论,鹤见介绍了与费的社会政治背景不同的日本著名民俗学家柳田国男(1875~1962)。鹤见在她那令人兴奋的比较中说明,两位天才的社会科学家如何为其本国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宇野断言,小城镇的兴起为亚洲提供了一种现代化模式。他注意到小城镇经济的发展为何迅速地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尽管在改变的同时,亲属群体的互助与互动、裙带关系和前现代官僚体制仍然存在。

李亦园强调了现代社会中传统力量的实力。在详细阐述了费关于中国农民基本价值体系的观点后,李解释了儒家的中和观念及其与民间信仰的联系。他还划分了农民用以解决传统和目前难题、精英们用以解答终极问题和解释日常生活危机的“和”的三个层次(天、人和社会)。李断言,这个分类与从古到今的“华夏”概念是一致的。

李试图定义“华夏”,而横山广子则提出了一个包括了某个少数民族及汉族在内的问题。在讨论云南白族所信奉的守护神的称谓变化的基础上,她重构了“土”概念的历史含义,并阐述了白、汉民族关系。她的论文从历史的角度提出了一个人类学难题,即东亚人类学的重大方法问题。

有两篇论文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韩国的祖先崇拜。伊藤亚人考证了韩国人和日本人对待祖先的方法。他解释到,韩国人依父系追溯多代祖先,而日本人却以草率的态度对待各自的先辈,将无名远祖归结为一种集体形式。他指出,这种差别影响了他们各自的历史感受。金光亿强调了在现代化与发展的背景下祖先崇拜传统重现的社会文化含义,正好与李沛良关于香港的论述形成呼应。

金认为,与某些新的和国外的祖先崇拜相反,传统的儒家祖先崇拜构成了优良韩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在韩国,祖先崇拜作为一种对国家权力和公共空间扩张的反映,它让人们去建构自己的历史与空间。

还有两位西方人类学家参加了这次讨论会,他们是英国的 A. 迈耶(Adrain Mayer)和美国的 L. 皮蒂(Lisa Peattie)。可以说,他们各自代表了费曾密切交往过的学术群体。A. 迈耶参加了讨论会,但却没有提交论文。对费的事业有着特别感受的 L. 皮蒂介绍了美国应用人类学的最近趋势并把费的经历与事业放在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框架中。

我代表这次讨论会的组织者,感谢财团法人地域社会研究所,国际交流基金和财团法人民族学振兴会,他们慷慨地支持了这次讨论会的召开和本书的出版。

我要特别感谢乔健教授,从这次讨论会的组织到本书的出版,他都给予了无私的帮助。我还要感谢那些在乔教授的指导下为本计划作出了慷慨贡献的人:龚丹先生,他修订了提交的论文包括我这的篇导言的英文,他还编制了索引;何锦贤先生和曾展娴小姐,他们为本书的出版作出了出色的努力。

作者系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译者:邱泽奇

人的研究在中国——一个人的经历

费孝通

八十岁可能是一条年龄界限，跨过了这条线，一个人会觉得心情上轻松、自由些，因为余下的岁月已不大可能改变一生已铸下的功过了。他可以有平静的心情来检视过去在人生通路上留下的步步脚印了。我感谢中根千枝教授和乔健教授给了我这个机会，并出了“人的研究在中国——一个人的经历”这个题目，要我在他们为祝贺我八十诞辰召开的“东亚社会研究国际讨论会”上作一次发言。这个题目的意思是要我回顾一下，我在人类学这门学科里做了些什么。当然我的工作能否代表中国的人类学界，那是很难说的。但我既然是中国人，我在这门学科里所做的工作无可否认是人类学在中国的表现。而且我的工作至少也反映了我同时代的学术方向。

但是这个题目从何答起呢？很为难了我。

当我正考虑这个问题时，乔健教授给我寄来了一本书：Sir Edmund Leach (E. 利奇) 写的“Social Anthropology” (《社会人类学》1982)。Edmund 是我在 L. S. E. (伦敦经济学院) 上学时的老同学。我们的友谊也并没有因几度隔绝而冲淡。1981 年访英时，我还跟他一起在 Cambridge (剑桥) 他的书斋里纵谈了一天，没有想到这是我们相叙的最后一次。当我们同窗的时候，在我们讨论班上，他是个雄辩出众的青年。他那种爽直、明快、尖锐的辞锋给我

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次在捧读这一本可能是他最后的著作时，我立刻感到他那种可爱的性格至老未衰，可惜的是这样的英才未获长寿。

读完了他这本书，我顿觉写这篇发言有门了。这是因为他在这本书里评论了其中有我一份的中国几个人类学学者的著作时，提出了两个问题，启发了我的反思。我的发言正好从此开始。

他提出的两个问题是：

1. 像中国人类学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

2. 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

Edmund 对这两个问题都抱定否定的态度。先以第一个问题说。他尽管承认人类学者不妨研究自己的社会，而且有些中国人类学者就是这样做了。但是他态度鲜明地说：“Certainly field research of this kind is not something which I would recommend for the inexperienced.” (p. 124. 无疑的，这种样式的实地研究，对没有经验者我是不会推荐的。)他接着列举了四本从 1934 年到 1949 年以英文出版的中国人类学学者的著作，并一一加以尖刻的评论。在他看来，其中除了一本，可巧是我的“*Peasant Life in China*”(《江村经济》)，在一定程度上(up to a point)，研究自己的社会看来是有好处的，其他三本都被他作为这种研究方法不足取的例证。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可能是出于“Their vision seems to become distorted by prejudices which derive from private rather than public experience.” (p. 124. 他们的眼光看来已被私人而不是公众的经验产生的偏见所歪曲了。)

Edmund 对人类学者研究自己社会的那种他自认是 my negative attitude (p. 127. 我的消极态度)，跟我们共同的教师 B. Malinowski (B. 马林诺夫斯基)恰恰是个鲜明的对照。后者在给我那本《江村经济》(*Peasant Life in China*, 1939)写的序言里说：“If it is